

怀念池必卿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

怀 念 池 必 卿

许 明 主编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怀念池必卿/许明主编.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8.11

ISBN 978-7-221-08217-6

I. 怀... II. 许... III. 池必卿(1917~2007) — 纪念文
集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31529号

怀念池必卿

许明 主编

责任编辑:姚必强

装帧设计:唐锡璋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邮编:550004)

印刷:贵阳经纬印刷厂

规格:787×1092mm 1/16

字数:340千字

印张:15

版次:2008年11月第1版

印次: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221-08217-6/K·1036

定价:45.00元

目 录

池必卿同志生平	中共中央组织部	1
回忆在池必卿同志领导下工作的岁月	朱厚泽	8
实事求是、敢于决策的省委书记	王朝文	22
历史大转折中的老书记池必卿	张玉环	32
深切怀念尊敬的池必卿同志	何仁仲	39
远距离视线中的池必卿	龙志毅	44
勇于解放思想 敢于实事求是		
——怀念池必卿同志以民为本的领导风范	王思明	52
一位优秀成熟的领导干部		
——追记在池必卿同志领导下的岁月	刘玉林 李万禄	57
深切怀念池必卿同志	王民三	64
难忘老书记的二三事	胡克惠	71
怀念敬爱的老领导池必卿同志	谢养惠	73
一个从实际出发的领路人		
——回忆池必卿同志在贵州	高春生	77
省报总编眼中的省委书记		
——记池必卿	刘学洙	102
振奋人心的岁月		
——贵州“包干到户”诞生记	李 菁	119
率先启动农村改革的大手笔	陈谨之	132

我过我的独木桥

——池必卿同志与贵州包干到户	许 明	137
永远的老头儿	陈群林	146
天门中断楚江开		
——池必卿同志二三事	丁济康	158
池老自有池老的魅力	伍席源	166
随池书记下乡 30 天	王保民	169
巍巍之岳		
——浅议池必卿同志在贵州工作时的二三事	李钟伟	176
改革浪潮兴起中的池必卿同志	陈策贵	181
难忘的一件事	许 镛	187
省委一把手高度重视公文处理工作	钱为方	190
爱民书记池必卿	尹洪来	196
一位真正的老革命		
——我心目中的池必卿同志	何 嵩	201
忆必卿同志感人的几件事	邓洪泰	208
艳红桃园忆念池书记	何慰先	213
怀念池必卿同志	王开文	217
稳定了农民这一头		
——贵州放宽农业政策纪事之一	许西记	219
痛苦的过程		
——贵州放宽农业政策纪事之二	许西记	223
包干到户姓“社”不姓“资”		
——贵州放宽农业政策纪事之三	许西记	228
后 记		233

池必卿同志生平

中共中央组织部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贵州省委原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池必卿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7年11月1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池必卿同志,1917年12月23日出生于山西省平定县上庄村,青少年时代先后在上庄村小学、平定县立中学附属高小、平定县立中学读书,1935年8月考入太原市友仁中学。“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他积极投身于学校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在进步同学的启蒙和帮助下,参加了学习和宣传新思潮的组织——读书会,阅读了许多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通俗读物。“西安事变”后,他参加了牺牲救国同盟

会、抗敌救亡先锋队(简称“抗先”)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等进步组织,并担任本校抗先队队长和民先队小队长,积极声援“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他逐渐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领导抗日救国和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中坚力量,树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定信念。193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爆发后,党组织派他回到家乡平定县组织游击队,并担任中队支部委员,开展抗日游击斗争。不久,同本县的其他游击队武装一起转入晋冀豫交界的太行山区,进行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先后担任北方局晋冀豫边区和顺县委委员兼二区委书记、平(定)东县委组织部部长、赞皇县委书记、井(陉)获(鹿)县委书记等职务。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他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游击武装,发展新党员,在基层普遍建立党组织,扩大了党的影响力和群众基础。1938年10月,他到晋冀豫边区党校学习。1939年2月任晋东南农民救国总会主席兼党组书记,1943年2月,晋冀豫边区改称太行分局后,改任太行分局五地委委员兼农会主席。他组织力量开展调查研究,将深入贯彻减租减息政策、确定农民永佃权和清理旧债作为农救总会的工作纲领,为巩固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贡献。1943年12月,他到太行分局党校参加整风,经过一年多的整风学习,他懂得了在抗日游击战争中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掌握了坚持思想领导、依靠积极分子、创造先进典型等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懂得了深刻领会党的指示和决定的重要性,认识到只有掌握了党的指示决定的精神实质,并在实际工作中灵活

运用,才是做好一切工作的保证。

1945年5月,池必卿同志调太行分局二地委工作,先后担任地委宣传部部长、副书记、书记,领导开展新解放区的反奸反特、清算匪霸等斗争,摧毁旧政权,建立民主政权和农会、工会等群众团体。1947年7月至9月,他参加了全国土地会议。他坚决贯彻中央指示,在解放区内,将原来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发展生产、建设解放区的积极性。他按照上级党委要求,在本地区党组织中开展整党运动,使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有了很大进步,党同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1948年8月,他调任晋冀鲁豫中央局晋中区党委宣传部部长,他广泛动员翻身农民参军参战,发动人民群众在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前线,为解放晋中广大地区作出了贡献。

1949年4月,太原解放后,池必卿同志担任太原市委办公室主任兼农村工委副书记,和市委其他领导一起着手恢复城市秩序和发展生产的工作。同年9月,他调任榆次地委书记、行署专员兼军分区政委,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抓住工作中的主要环节,有效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和“三反”、“五反”运动,研究制定了改变山区农村落后面貌的农、林、牧全面发展的政策规定,并在工业生产中进行了民主改革。1952年3月,他调任山西省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兼省委党校校长。他坚持宣传教育工作必须为中心工作服务,必须与工农业生产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努力做好有关工作。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他积极宣传贯彻。1954年9月,他调任第

二机械工业部大同六一六厂筹备组主任,负责筹备我国第一个坦克发动机生产基地。1955年8月,他担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兼太原市委第一书记,积极稳妥地在太原市开展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1月,他担任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在分管工业生产的工作中,抵制日渐凸显的急躁冒进倾向,克服“大跃进”对工业生产造成的破坏,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坚决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方针,努力克服经济困难。1961年11月,他调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和华北局的领导同志一起集中精力抓工农业生产,在制定年度计划工作中突出农业和市场问题,在农村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坚决克服各项工作中的“左”倾思想和错误做法。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池必卿同志就受到冲击。1967年7月,在北京军区支农支工小组协助工作。1969年7月任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1971年6月,他再次受到“四人帮”的诬陷和迫害。1975年8月恢复工作后,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按照中央“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在全区范围内进行治理整顿。粉碎“四人帮”后,他积极参与领导了全区揭批“四人帮”罪行的斗争。

1978年6月,池必卿同志调贵州省工作,先后担任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代理省委第一书记。1980年7月起,担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进行政治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平反冤、

假、错案,坚决消除派性;他坚决把全省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组织制定了富民强黔的发展规划,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率 and 经济效益;他尊重农民群众的要求和意愿,冲破重重阻力,在全省农村推广“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土地生产经营权交还给农民;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重视调查研究,经常深入地、县和农村社队,倾听干部群众意见,共商发展农业的政策措施;他重视党员队伍建设,加强党内生活民主化,不断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水平和工作水平;他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支持编修贵州地方史志,发展贵州旅游事业,加强与其他省区的交流与合作。他在贵州主持工作的几年间,全省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安居乐业,为今后更好更快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7年11月,池必卿同志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积极参加中顾委的各项活动,积极为中央决策提出意见和建议,圆满完成中央交办的各项任务。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拥护党中央采取的一系列重大决策,表现出一名老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党的十四大后,他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他不顾年老体弱,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时刻关心党和国家的发展事业,非常关心革命老区的经济建设。他积极参加老干部党支部的学习活动,以普通党员身份谈思想、讨论问题,体现出较强的组织纪律性。他坚持学习,笔耕不辍,将自己近六十年的革命活动进行回忆整理,撰写出几十万字的《功在桑梓,情留大地》一书,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生前就写下后

事从简、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的遗嘱,他与中顾委其他26位老同志向中央写的《关于取消向遗体告别仪式的建议》的信,得到了中央的肯定。

池必卿同志是中共八大、十三大、十四大代表,中共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被邀列席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

在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池必卿同志始终坚信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立场坚定,百折不挠,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深刻领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提高理论素养,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他重视调查研究,经常深入基层,获得第一手资料,从中确定正确的工作方向。他讲求工作方法,善于抓住主要问题,争取各项工作协调发展。他维护团结,顾全大局,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善于启发大家充分发表不同见解。他为人正派,生活俭朴,从不搞特殊化,带头反对和纠正不正之风。他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坚持走群众路线。他善于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敢于承担责任,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揭露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坚决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

池必卿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党和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的一生。他的逝世,使我们党失去了一

位好党员、好同志,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可敬的老书记、老领导,我们深感悲痛。我们要缅怀他的革命业绩,学习他的优秀品质,弘扬他的崇高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扎实工作,开拓进取,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回忆在池必卿同志领导下工作的岁月

朱厚泽

池必卿同志是贵州摆脱“四清——文化大革命”的阴影，拨乱反正，端正思想路线，平反冤假错案，着手农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启干部新老交替之门，走向新的发展这一历史性转折时期，备受尊敬、信赖的贵州省委主要领导人。

必卿同志已经于2007年11月17日去世，类似我这样年龄和经历的贵州干部，内心分外怀念他。回忆当年在他领导下工作的情景，就像一个一个电影镜头，在我心中萦回。

我第一次见到必卿同志，十分偶然。那是1978年底北京正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我随原贵阳市委第一书记伍嘉谟同志、书记夏页文同志，按原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同志事前所作的安排，到花园村李的家里，当面向来京参加会议的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汇报1964年贵阳“四清”的严重情况和受到错误打击的大批干部、群众现时的困难处境，促请省委切实抓紧平反冤假

错案。我是主要汇报人,情况说得很简短。我当面“放炮”,批评当时省委对平反贵州“四清”中的冤假错案拖延、敷衍。当时在场的除省委第一书记外,还有和他一起来的高鼻梁、深眼窝的高个子老头,这位老头除中间插过一两句话外,只是平静地听着,并未引起我们特别注意。会后回到中组部东华门小招待所翠明庄,我整理纪录,这才找人打听,得知那位老头是新调任贵州省委的另一位主要领导人、老资格的原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池必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几年间,由于必卿的果断和贵州许多老领导同志坚持正义、热情推动,中央和耀邦同志平反冤假错案的决策在贵州提速行动,“文化大革命”、“四清”、反右倾、反右派以及贵州地下党和历次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大量得到纠正、昭雪平反。许多沉冤久远的老人得以恢复正常的社会、政治生活,安度晚年;许多被赶出城市的家庭,得以重返家园,子女得以一视同仁、入学就业;许多被弃多年、长期被视为“异类”的知识分子和中青年干部得以重新起用。我就是这个时期,在平反、恢复党籍后,经省委重新任命参与贵阳市委领导工作的。

我与必卿直接的接触,开始于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贵州代表团到京,被安排在牛街住清真寺旁的宾馆,我们不习惯牛羊肉的膻味,几个人在下边议论想提意见,据说必卿不让讲。我原来以为他是北方人,很习惯,谁知他根本吃不了牛羊肉,结果只能每天给他煮一碗北方汤面,或者加个鸡蛋。整个会期他就这么过的,我才体会到他的顾全大局和生活俭朴。后来我上他家里,他的夫人徐若冰同志让我品尝她家的北方味,我只觉得从山西带来的腌小黄瓜,手指粗细,特别好吃,其他东西,都难与南方相比。

党的十二大结束,我直接回贵阳,在市委书记夏页文同志主持下,向市委、市级机关、企业、学校传达大会精神,组织学习大会文

件。1982 年底,中央通知让我离开多年工作的贵阳市转赴省委,在必卿直接领导下参与贵州省委的领导工作。

当时省委正筹备召开省党代表大会,组织起草工作报告。必卿多次听取起草小组汇报,提出修改意见,但始终表示不太满意。最后是他亲自动口动手,以很精炼的语言定稿,被人称为贵州省委历来篇幅最短的代表大会报告。报告题目也没有沿袭党的十二大的标题,而是用了为争取三个“根本好转而斗争”。表达了他从贵州这个内陆发展滞后省份当年的实际情况出发,对此后一段时期发展前景估计的审慎态度。

我到职后,从宋树功同志处接下了省委秘书长的日常工作,尽快熟悉省委的决策过程和机关前后任领导人,依靠办公厅、研究室、农工部等机构的一批年轻同志,向下跑,尽快联系各地、州、市的领导同志,断然把主要精力放到了了解我原未曾多接触的全省情况,特别是各地、州、市、县的情况上。

当时贵州农村包产到户的激烈争论大体过去,必卿和他“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的名言,在贵州干部中近乎家喻户晓。贵州人口绝大多数是农民,全省整个经济基础还是农业,省委工作重点历来在农村。面对这么个新形势,抓什么,怎么抓呢?

我把中央的整体部署精神和我们从地、市、县、区农村调查中了解的情况结合起来形成的一些想法,前前后后,断断续续,向他汇报请教:在继续稳定包产到户责任制度,注重边远山区扶贫济困,保护农民耕种积极性的同时,把领导注意力转向对农村专业户和乡镇企业的扶持,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农村专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这就要改革农产品购销制度,疏通商品流通渠道,发展民间商业和运输业,抓紧公路建设和场坝、城镇、城市的市场建设和市政建设。这就涉及转变传统的计划经济、国营垄断、政府控制等一整套思想

观念和体制；涉及党政关系、政企关系、地区关系及其机构和运作方式等一整套调整和改革。这一来，城乡改革势必要结合起来，联动推进；干部的教育、选拔势必重新安排，相应转变……而这一切都必须从贵州的省情出发。我深感对贵州省情的系统了解，深入研究太不够了。

我向必卿说：“这个事情，可是太大了。”下边的话已到口边，我想说“力不从心”。但他打断了我的话，没有让我说出来。他高兴地说：“这就对了嘛！还想用过去‘催种催收’那老一套来对付现在的城乡经济局面，行吗？！”他赞赏地说：“就按这个思路去搞。你不只是管农村，要代表省委把城市也一同抓起来，沟通城乡联系，调整国营工业、商业，发挥大三线企业的作用，谋划全面改革和今后发展。还要抓党校，轮训和培养干部。注意大学和科研院所，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可以搞个小的班子，联系一批专家，共同来研究省情，制订近期改革方案，策划未来的长远发展。”

那几年，省委的徐健生同志、秦天真同志、吴实同志几位老领导人，从贵州的省情和国际经济发展的经验和趋势出发，确实是高瞻远瞩，早就注意到贵州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民族特色，不辞辛劳，深入大山深处，亲自发现景观，勘察景点，规划协调，督促实施，倡导发展旅游业。而我那时还只顾上“吃饭穿衣”，没有“回过神来”。健生同志严厉批评我：“织金洞，你去看过没有？还是你的老家呀！”我向健生作了检讨，和省委几位同志一起，在健生的督促和亲自带领下第一次进洞察看。必卿得知此事，非常赞扬健生，赞扬天真和吴实，提醒我认真注意全局。后来，又以他到南斯拉夫喀斯特地区的亲身考察的经历，当面向耀邦推荐贵州的独特岩溶景观和丰富的旅游资源，争取中央机关对贵州旅游业开发的支持。

必卿和几位老同志深知贵州生态系统极其脆弱，破坏十分严

重,而又是珠江源头和长江重要支流的生态屏障,开发必须小心谨慎。为了子孙的持续生存,要下大决心保护环境。我那几年抓紧时间自己跑宽阔水、洛龙和大、小沙河,赤水、习水林区以及几条江河上游等处查看,都得益于他们的经常提醒。草海的恢复和几个自然保护区就是在天真和几位老同志、老专家们的督促下,省、专县各级政府共同努力实现的。

1984年前后,全国粮食增产,有的销区省拒绝调入,与粮食主产区闹矛盾。我和政府几个同志都比较一致,坚持每年20多亿斤粮食调入不要减少,除用于发展传统名酒,更着重于用在退耕还林、还草上,希望逐步把大面积毁林、毁草、开荒占用的大斜坡地退下来,恢复生态。

在必卿领导下,省委那个时期的工作大体就是沿着上述思路摸索着做的。

他对我的工作很放手,总是鼓励我和省委比较年轻的几位同志“大胆放手干,有问题我负责”。他自己则经常下基层,观察工作进程,发现问题和经验,随时提醒我们。同时,深入观察和思考进一步前进中深层次的问题。他曾深情地向我提出过一个问题:“包产到户以后,我们的工作似乎没有什么‘得心应手之作’了。你感觉如何?是个什么问题?为什么?”

这使我在处理日常工作外,同时注意发现和思考社会变革进程中的更深层次的事物。

1983年冬,中央作出整党决定。

事隔不久吧,刮起了一股清理精神污染的风。许多外省区的省委领导人纷纷在党报要闻版面上发表重要谈话,像是表态的样子。我却没有看见必卿有什么谈话。后来一个经济报纸的记者还找我问,我说:“中央说过,不搞污染嘛。”